

原富：罗斯金的词语系谱学

乔修峰

内容提要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和政治经济学的传播，“财富”逐渐成为 19 世纪英国文人话语和日常语言中的热词。约翰·罗斯金对该词背后所含的价值取向深感忧虑，他在 1860 年代写下大量文字重诠财富概念，锋镝指向推究“国民财富性质及其原因”的政治经济学，旨在借助“词语系谱学”重建权威知识话语，挽救世道人心。这番“原富”既反映了文人在变革年代的词语焦虑，也反映了经济学在寻求学科地位过程中因“去道德化”而引起的诸多问题。

关键词 罗斯金 财富 词语 政治经济学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和政治经济学的传播，“财富”（wealth）成为 19 世纪英国文人话语和日常语言中的热词。现代学者更多关注该词自 18 世纪中叶以来所有的“国民或国家集体财富”含义，而 19 世纪的很多英国文人关心的却是该词日渐消弭的古义，尤其是自 13 世纪起就有的“幸福康乐”和 15 与 16 世纪间所有的“精神康乐”之义。这两层含义本是《牛津英语大词典》（OED）“财富”词条的前两个义项，却均已成为“废失之义”。当时文人对这一词义变迁的讨论，主要源自他们在变革社会中对知识话语体系的反思。

约翰·罗斯金在 1860 年代写作的核心便是重诠“财富”概念。他的“原富”针对的是推究“国民财富性质及其原因”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但最终目的却是通过追溯该词的系谱来重构价值观念，挽救世道人心。罗斯金的论述策略虽类似于剑桥思想史学者科里尼所说的“公共道德家”^①，通过利用并改造读者的共享词汇来增强说服力，但又有他鲜明的个人风格。

^① Stefan Collini, *Public Moralists: Political Thought and Intellectual Life in Britain 1850 – 193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p. 4.

一、罗斯金的词语系谱学

罗斯金对词语的痴迷早已引起特罗洛普、王尔德等同时代文人的关注，^①也有现代学者说：“罗斯金有个让人苦恼的问题，那就是对语言的痴迷。对他来说，词语就是鸦片。他的大脑一旦让词语使用，也就几乎被词语给宰制了。”^②出生于苏格兰酒商家庭的罗斯金没有上过公学或文法学校，但曾深造于牛津，在古典语言方面颇有造诣，任教牛津期间又与德裔比较语文学家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多有交往，深谙“训诂”之道。在他看来，溯求词源，考其流变，不仅是文人的基本功，更是批评社会的利器。通过追溯词语的“初始”含义，比较古今词义异同，可以管窥社会关系与道德风习的嬗变。

罗斯金在其中后期创作中频繁地假借词源考证来建构道德，既与他个人的思想发展有关，也与当时文坛的风气有关。塞鲁蒂认为，罗斯金在1850年代对基督教失去了信仰，不再将自幼熟读的《圣经》看作惟一的真理源头，开始转向语文学，为其道德观念寻找支撑，而词源学尤其能够证明人类语言的生命延续，“于是，逻各斯仍为统治世界的力量，但它的权威不应在神启中寻找，而应到历史中求索”^③。这种解释与罗斯金的智识发展历程大致吻合，但也不能忽略更大的知识语境。语文学的兴起固然启迪了他的论述策略，但当时的社会变革和各种理论学说的涌现对原有话语体系和权威的冲击，才是促使他拿词语做文章的主要原因。斯托达特认为，1870年代的英国文人领袖多尚清谈，导致一些关键术语的所指游移不定，连他们自己交流起来都十分困难，遑论以此觉民喻世了；而罗斯金反复征引词源，就是要把那些词语的意义确定下来。^④其实，这种词语混乱状态此前已十分严重，罗斯金是在尝试重构权威的话语体系。不过，罗斯金的笔法毕竟与语文学家的“科学”求证不同，他通常只是假借词源学权威来佐证道德批评。其考证虽也溯求词源及词义嬗变，但通常带有批判甚至颠覆意味，与尼采的《道德系谱学》风旨相类，不妨称之为“词语系谱学”。

① See J. L. Bradley, ed., *Ruskin: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p. 298, p. 310; Oscar Wilde, *Plays, Prose Writings and Poems*, New York: Everyman's Library, 1991, p. 27.

② Christopher Bliss, "Ruskin's Political Economy of Art", in *Oxford Art Journal*, 2.2 (1979), p. 36.

③ Toni Cerutti, "Ruskin and the Fascination of Words", in Giovanni Cianci & Peter Nicholls, eds., *Ruskin and Modernism*,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 116.

④ See Judith Stoddart, *Ruskin's Cultural Wars: Fors Clavigera and the Crisis of Victorian Liberalism*,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8, p. 4, p. 7.

这个说法罗斯金本人没有用过，却也不违他本意。他在著名的讲演《国王的宝藏》（“Of King's Treasures”）中指出，所谓“文人”，就是精通文字之人，能分辨词语的血统、身世和功用。这篇讲演的第十八段是他的得意之笔（他后来多次提醒读者参考），他将词语比作人，把词源学比作考究家系血统的学问：

要养成细究词语的习惯，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辨析，以确定词义。尽管只是因为承担语言符号功能时，字母与声音相对，对书的研究才被称作“文学”，精通此道的人才被各国通称作“文人”（man of letters）而非“书工”（man of books）或“词匠”（man of words），但你仍可以将这个带有些偶然性的命名方式与以下这个千真万确的道理联系起来——你如果寿命够长，或许能够读遍大英博物馆的藏书，却仍是个彻头彻尾的“文盲”，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但如果有一本好书，你只读了十页，却是逐个字母地读，也就是说理解得分毫不差，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你就永远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衡量一个人是否受过教育（仅限智识方面），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是否达到了这种准确程度。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也许并不兼通多语，也许只会说母语，也许只读了少量的书，但不管他懂哪种语言，他都把握得很准确，不管他说什么词，吐字发音都很准确。更可贵的是，他还熟稔词语的门族系谱（peerage），一眼就能区分哪些词是血统古老的贵族正裔，哪些词只是现代的黔首愚民；他能记得词语的整个世系——包括它们之间的通婚、最远的亲属关系，记得它们曾于何时何国在多大程度上被该国词语中的贵族阶层所接纳，以及担任过哪些职务。^①

罗斯金认为，了解词语系谱，既可增强表述的准确性，提高思辨能力和对社会变革的敏感度，又能警惕词语对思想的腐蚀。在他看来，不明辨词义，就无法估量“意义含混的冗词赘言”（loose verbiage）^②和“轻率粗疏的用词”（verbal carelessness）^③对思想和世道人心的破坏。他在前述讲演中指出，“词语若不加看管，有时会带来致命危害”，欧洲人就被一些“假面词语”（masked words）给操

① John Ruskin, *Sesame and Lilies, Unto This Last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rt*, London: Cassell, 1907, pp. 22 - 23.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② John Ruskin, *The Works of John Ruskin*, vol. 17, E. T. Cook and Alexander Wedderburn,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25.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卷次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③ John Ruskin, *Modern Painters*, vol. 5, London: J. M. Dent, 1907, p. 240.

纵了：

没有人理解它们，但人人都在用，绝大多数人还会为之战斗、生活甚至牺牲，以为它们指的就是对他们很重要的这种、那种或其他事物，因为这些词都穿着变色龙的外衣，可以变成任何人心中所幻想的地面颜色。它们就趴在地上，等着一跃而起，把人撕碎。从没有猛兽像这些假面词语这般狠毒，从没有外交家像它们这般狡猾，从没有投毒者像它们这般致命。它们是众人的思想的贰臣。不管一个人最珍视的幻想或喜好是什么，他都会交给他喜欢的一个假面词语替他去打理；而这个词也就最终对他拥有了无限的权力——你若想接近他，只得通过这个词的襄助。（*Sesame*：24）

罗斯金发现，18世纪中叶以来渐成显学的政治经济学不仅影响了整个知识话语（连他本人都在谈“艺术的政治经济学”），而且通过对日常语言的腐蚀，绑架了人们的思想。他在《现代画家》第五卷中谈到，他在1855至1860年间研读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时，就发现这些学说已经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当代政治经济学家说：‘既然在当下世界只有魔鬼的法则切实可行，那么，我们也就只能追求野兽的欲愿。’信仰、慷慨、诚实、热忱、自我牺牲之类的词语，都只能在诗文里见到，没有一样能在现实中指望得上。”^①他在此后十多年里先后写出了《给那后来的——关于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文章四篇》（*Unto This Last*）、《报以灰尘——政治经济学散论》（*Munera Pulveris*）、《芝麻与百合》（*Sesame and Lilies*）、《野橄榄花冠》（*The Crown of Wild Olive*）、《时与潮》（*Time and Tide*）等作品，集中探讨了政治经济学对词语的腐蚀。^②他在《报以灰尘》中指出，当今所谓的政治经济学，抛却了“政治”所含的国家、社会之义，只顾研究商业现象，与柏拉图、色诺芬、西塞罗、培根等先贤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毫不沾边，误导了人们对一些词语的认识，如果放任不管，就会使人误读先贤们的思想。因此，他力图回归那些政治经济学词语的原初含义：

在这些文章中，我保留了所有重要术语的字面意义和初始意义，因为一

^① John Ruskin, *Modern Painters*, vol. 5, p. 331.

^② 《给那后来的》、《报以灰尘》和《时与潮》被《罗斯金文集》的编者视为“政治经济学专论”，收入文集第17卷，并在该卷绪论中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see *Works*：17：xix-cxv）

个词最初因需要而被制造出来的时候，它的意义最为得宜。初始意义蕴含了该词在其青年时代的十足活力，后来的意义则经常被扭曲或日渐衰弱。而且，在一个被误用的词的背后，大都有一堆混乱的思想。因此，不管在谈论这个话题还是其他任何话题时，细心的思想家都必然会准确地使用词语。我们要想理解他们的言论，首先就要明确地界定这些术语。（*Works*: 17: 147-148）

这实际上就是要厘清当时政治经济学对这些词语的“误用”，回归它们最初那种“深刻而富有活力的意义”。

他认为，“价值、财富、价格、生产等术语都还没有很好地定义，公众尚不解其义”^①。其中，又以“财富”最为重要。他在为文集《报以灰尘》补写的序中说，他在发表那些文章时，还没有人界定过“财富的性质”。他在写那些文章期间也曾致信友人说：“（现今所讲的）政治经济学从其最基本的根基上来说，完全就是一个谎言……当今时代所有的邪恶都是这门‘科学’做的孽……他们连金钱是什么都不知道，却在没有界定财富的情况下，把作为财富符号的金钱捧上了天。你自己试着给财富下个定义，立马就能发现他们从根上就错了……”（*Works*: 17: 131）早期的罗斯金研究者库克认为，该书书名源出贺拉斯的诗句，意在讽刺当时政治经济学的财富概念将灰尘奉为神祇，引导人们误将尘土当作珍宝来收集。^②可见，罗斯金探究“财富”概念的系谱，表面上是批判政治经济学，但根本意图还在于纠正世道时风。他认为自己这番“原富”具有开创性意义，他在《给那后来的》一书序中说，该书是要“从逻辑上界定财富”，柏拉图和色诺芬曾用古朴的希腊文界定过，西塞罗和贺拉斯用典雅的拉丁文界定过，而他这是第一次用平凡的英语进行界定（*This*: 161）。

二、“财富”通俗定义的社会史考察

罗斯金在《艺术的政治经济学》序言中说，他不喜欢当代的政治经济学著

① John Ruskin, *Unto This Last and Other Writings*, ed. Clive Wilmer, London: Penguin, 1997, p. 204.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② See E. T. Cook, *The Life of John Ruskin*, vol. 2, London: George Allen, 1912, p. 55.

作，只是在20年前读过亚当·斯密。^①不过，他重点批判的却不是上一世纪的《国富论》，而是同时代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是当时这一领域名气最大的著作，其中的“财富”定义也是最广为接受的。^②穆勒在该书开篇提出，政治经济学只是新近才被看做是科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的主题就是财富。虽然穆勒也注意到财富概念的混乱曾使欧洲走向歧路（即重商主义学说误将财富看做只由货币或贵金属组成），但他无意做出精确定义，只求表达的概念足够明确，因而采用了财富一词的通俗用法。^③

穆勒沿用通俗定义，除了认为这个定义没有太大问题之外，或许也是想与更多读者在基本概念上形成共识，便于展开讨论。而罗斯金却认为讨论的前提就是要明辨词义，含混的词义必然影响认知。他从词源上做了一个类比。从希腊语源头来看，“经济学”（*oikonomia/economy*）直译为“家律”（*house-law*），“天文学”（*astronomia/astronomy*）直译为“星律”（*star-law*）。由是观之，经济学不严格定义财富，就如天文学不严格界定星的所指。星有发光的恒星与反射光的行星之分，财富也分“发光的财富”（*wealth radiant*）和“反射光的财富”（*wealth reflective*）。前者是内在固有的，有生命力的，能照亮生活；后者却仅指“riches”（为行文方便，文中权译作“富”，以区别于“财富”），是前者的符号体系（see *This*: 161–162）。如果政治经济学家只研究如何致“富”，那么就像只研究反射光而不顾发光源的星学家那样误入了歧途。

罗斯金曾在《给那后来的》手稿中指出，当时大多数人都将财富（*wealth*，构成个人幸福康乐的东西）等同于“富”（*riches*，构成个人对他人权力的东西），却不知这种混淆危害很大，因为“富”是一个相对术语，是相对“穷”而言的。如同“冷、暖”表示的只是一种相对而非实际的温度，“富”这个概念要想成立，就需要有“穷”这个概念。如果人人皆富，没有人穷，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富”。由此推知，要实现这种“富”，就必须得有人“穷”。使自己致“富”之术，也就是使邻人不能脱贫之术（see *This*: 340, 180, 181; see *Works*: 17: 160）。换言之，只追求这种“富”，也就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他还进一步指出，政治经济学如果只是“研究如何致‘富’的科学”，自然也就名不副实。既然“政治”的词根是“*polis*”（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学就应追求增加国家

① John Ruskin, “A Joy For Ever”: *The Two Path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p. 12.

② 参见 OED 的 “wealth” 词条

③ 参见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3–14、66页。

或国民之富；如果只求个人致富，就应叫“商业经济学”（mercantile economy），因为“商业”的词根是“merces/ pay”（交易、支付），它不必然带来国家或国民之富（see *This*: 180 - 181）。

罗斯金不满穆勒采用“财富”的通俗用法，恰在于他希望政治经济学能够改正这种用法，还原该词原有的道德和精神意蕴。大众将财富等同于“反射光的财富”或“商业财富”并趋之若鹜，固然是与社会的发展相随而至的，但这种风习如果不加遏制，就有可能形成一种反社会的力量。在罗斯金看来，这表面上属于经济现象，但根本上还是伦理问题。他认为，人们求“富”，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权力。这并非罗斯金的创见，法国人托克维尔曾在《美国的民主》中说：

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们有许多热望，绝大多数热望要么终结于对财富的渴求，要么来自于对财富的渴求。不是因为人们的灵魂更加狭隘，而是因为在一个时代，金钱确实更为重要。当全体社会成员彼此独立或互无关系时，只有通过金钱支付才能得到彼此的合作。于是，财富的使用无限增多，财富的价值也增加了。^①

这自然也适用于日趋民主化的英国社会，马克思和卡莱尔都曾探讨过“现金支付”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与托克维尔相反，罗斯金认为这种财富追求恰恰源自灵魂的狭隘，因为人们真正渴求的乃是对他人的权力。此权力的大小，与穷人数量成正比，与富人数量成反比。为获得更大权力，就不仅要使自己更“富”，还要尽量使更多的人变得更“穷”，从而形成对自己有利的最大不平等。也即说，一个人兜里的金币到底有多大力量，最终取决于他邻人兜里有没有（see *This*: 180 - 182）。因此，财富根本上还是属于道德范畴。他在《报以灰尘》中提到，财富（wealth）、金钱（money）、“富”（riches）常被当作同义词，但实际上它们指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属于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富”是一个相对术语，指某人或某社会之财产相对于其他人或其他社会财产的大小，属于道德科学，探究的是人与人在物质财产方面的关系（see *Works*: 17: 152 - 153）。而且，对它的渴求是没有止境的。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曾描述过一种“嫉妒性对比”，即追求在财力上超越其他社会成员，若身处劣势便心存怨尤，但即便达到了本阶层的正常标准也不会满

^①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Arthur Goldhammer, trans., New York: The Library of America, 2004, p. 722.

足，还会想着更上层楼。^① 由此不难理解罗斯金为何认为这种“富”关乎道德和灵魂，因为唯有道德趣味和精神追求才有望抑制这种无尽的欲望。其实，亚当·斯密在晚年修订《道德情操论》时也已经认识到，羡慕甚至崇拜富人和权贵，鄙视或至少是忽视穷人和草民，是导致英国道德情感堕落的重要且最为普遍的原因。^②

从19世纪英国社会史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金钱权力的实际作用和影响。韦伯夫人（Beatrice Webb）在《我的见习期》中提到，她那信奉政治经济学的母亲认为“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无视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永远瞄准社会最高层，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每个人只有这样不懈地为自己和家庭的利益奋斗，才能实现最高程度的普遍文明”；这一原则也“的确得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中产阶级代表人物们真诚热烈的拥护”^③。但如何提升社会地位呢？韦伯夫人说，19世纪后期伦敦社交界呈现出多元化倾向，门第等级划分不再那么明显，似乎有不重出身的特点，但实际上，还是有一个门槛，只是人们不太注意，那就是要拥有别人所没有的某种权力，而最直观、最明显的权力莫过于财富。她曾问一位外国富贾为何喜欢寓居英国而非巴黎、柏林或维也纳，此人回答说英国社会更平等。但她认为，这种平等，实际上是用金钱标准取代了门第出身。^④ 尽管出身在19世纪英国一直都很重要，但对那些未能口衔银勺生在朱门的人来说，毕竟有了另一条康庄大道。伊恩·布鲁玛在分析19世纪外国人如何看英国时就发现，对金钱的膜拜意味着地位身份是流动的商品，只要付得起就可以拥有。^⑤ 不妨再引托克维尔的话：

现在，古老事物所带来的声望威信已经消失，人们不再或很少靠出身、阶层或职业来区分。只有金钱还能使人们明显区别开来，使一部分人不同于其他人。财富给人带来的这种区分，随着其他所有的身份标志的消失和减弱而得到增强。在贵族制国家，金钱只能引向欲望圈上的几个点；但在民主制国家，金钱似乎能够达到欲望圈上的任何一点。^⑥

① See Thorstein Veble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Martha Banta,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6, p. 29.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② See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D. D. Raphael and A. L. Macfie, e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61.

③ Beatrice Webb, *My Apprenticeship*, intro. by Norman MacKenzi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5.

④ See Beatrice Webb, *My Apprenticeship*, p. 50.

⑤ 参见伊恩·布鲁玛《伏尔泰的椰子》，刘雪岚、萧萍译，读书·新知·生活三联书店，2007年，第111、116页。

⑥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pp. 722–723.

从19世纪英国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金钱即便没能成为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志,至少也是重要标志。不过,这种改变地位的方式对大部分下层民众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毕竟,在霍布斯鲍姆所说的“资本年代”,只靠勤劳,没有资本,仍然很难发迹。被罗斯金嘲讽为“商业抽奖”(Works: 17: 277)的飞来横财(如获得遗产)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加重了人们的投机心理,成了当时“英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狄更斯的《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书名语带双关,因为这个词组在当时还指“在遗产方面大有盼头”。《牛津英语大词典》甚至引此为例句,指出“expectations”作为复数,可指未来有望获得遗产或从遗嘱中获益。这种盼头一旦遂愿,往往能改变命运,尤其是社会地位。这也是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们常用的叙事策略。《小杜丽》中杜丽一家从阶下囚变身上等人,靠的就是突如其来的遗产;《简·爱》中女主人公能感到独立,她叔父留给她的遗产功不可没。当然,这种盼头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名利场》中年轻的女主人公委身老朽,《米德尔马契》中镇长公子举债度日,都是因为强求酿造了悲剧。不过,他们之所以会有这种心理,还是因为有他人成功的先例。可以说,正是由于金钱在资本年代拥有强大的权力,很多人才甘为其奴。^①

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从人类学和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探讨过财富。他认为财富起初是个人能力的证明,但后来变成了本身就值得赞扬的东西,具有了内在的荣誉性,能给持有者带来地位和声望(see *Theory*: 24)。马克斯·韦伯认为,这种荣誉还得到了宗教伦理的支持。对于19世纪“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人物,也即英国曼彻斯特那些白手起家的工业暴发户来说,挣钱不只是为了说明自己混得不错,更是为了表明自己干得不错;挣钱已不仅是为了满足物质需要,更是人生的终极目标,是胜任“天职”的结果和表现。^②在这种大环境下,财富也就在心理上改变了人们对自我和他人的认知,如凡勃伦所言:“一旦拥有财产在大众眼中成了尊荣的基础,它也就成了我们叫做自尊的那种满足感的必然条件。”(*Theory*: 25)

狄更斯善于描绘名利场中财富对心理的影响。从他的小说中不难看到,很多人确实如罗斯金所说把钱(money)等同于财富。《董贝父子》中五岁的小保罗向父亲董贝提出了一个简单却又引人深思的问题:“钱是什么?”董贝先是说“金、银、

① 即便不求远大前程,也要受金钱挟制。柴米油盐自不必说,政治权利也要求经济基础。在沸沸扬扬的前两次议会改革法案中,想要获得选举权,首先就得拥有或租住年租金至少十镑的房子(ten-pound householder)。

② See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alcott Parsons, trans., London: Routledge, 2001, pp. 28-33, pp. 18-19.

铜。几尼、先令、半便士”，接着又说“钱可以做任何事”，最后解释了“钱何以能使别人尊敬我们，害怕我们，看重我们，巴结我们，羡慕我们，能使我们在所有人眼里看起来都无比强大，无比荣耀”^①。《我们共同的朋友》中有位伦敦金融城小职员的女儿，虽不慕虚荣，但仍无奈地说：“我爱钱，我想钱，想得发疯。我恨自己穷，穷得丢人现眼，穷得讨嫌生厌，穷得可悲可怜，穷得没有人样。”^②而《艰难时世》中白手起家的银行家庞得贝之所以意气洋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自己与他人眼中的“成功人士”。毕竟，“对于并非生于贵族之家的人来说，其所追求的至善，便是成功”^③。成功本有多种，但经济上的成功却被许多人当成了唯一标准。不成功甚至等同于下地狱。托马斯·卡莱尔无奈地说：“地狱这个词英国人还经常在用，但很难确定他们到底指的是什么。”他解释说，地狱通常指一种无尽的恐惧，基督徒怕自己在上帝面前被发现是罪人，古罗马人怕自己没能成为有德之士，而当代英国人怕的是“没能取得成功”，也即没能挣来钱，没能混出名，而且主要是没能挣来钱。^④罗斯金则揭示了这种成功背后的权力关系：“（当社会由竞争法则引导时）成功总是指战胜你的邻人，从而掌控他的劳动并从中渔利。这是所有横财的真正来源，没有人能靠自己的勤劳大发其财。”（*Works*: 17: 264）

心理认知需要他者的目光。对“成功人士”来说，即便富过陶朱猗顿，如果只是衣锦夜行，也无法获得最大满足。他们需要向世人证明自己是个有钱人。按罗斯金的逻辑，炫富从根本上说就是炫耀权力，尤其是对他人的支配权力。凡勃伦认为，炫富的方法有两种，要么证明自己“有闲”，要么借助“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在交通发达、人口流动频繁的社会中，后一种方式更有效，也即拥有人们能直接观察到的可夸示财物（*Theory*: 29, 59 - 60）。奢侈品就是明显的可夸示财物。罗斯金对此颇多微词，甚至建议英国人都改穿“国服”（national costume），既能“满足人们希望穿好一点的愿望，又不会引起要比邻人穿得更好的欲望，也不会勾起要让人误以为自己属于更高阶层的奢望（后者是英人独有的怪癖）”^⑤。罗斯金比凡勃伦更早地谈到了“炫耀性消费”。他在《芝麻与百合》中特意解释了“炫耀”一词。他说，当时的父母很关心孩子

① Charles Dickens, *Dombey and Son*, Peter Fairclough, ed., London: Penguin, 1985, pp. 152 - 153.

② Charles Dickens, *Our Mutual Friend*, Adrian Poole, ed., London: Penguin, 1997, p. 45.

③ Walter E. Houghton, *The Victorian Frame of Mind, 1830 - 1870*,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191.

④ See Thomas Carlyle, *Past and Present*, Henry Duff Traill,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45 - 146.

⑤ John Ruskin, *Modern Painters*, vol. 5, p. 316.

的社会地位，希望孩子能“出人头地”：

现在，实际一点说，“出人头地”指的就是要在生活中博取众人的眼球（conspicuous）——获得一种在别人看来体面或荣耀的地位。一般来说，我们不认为这种出人头地单指挣钱，而是指让别人知道自己挣了钱；不是实现任何伟大的目标，而是让别人看到已经实现了目标。简言之，我们指的是满足我们对掌声的渴求。（*Sesame*: 13）

用他的例子说就是，水手想当船长，只是为了被别人叫作船长。他指出，真正的“出人头地”（advancement in life），是逐渐拥有高尚的心灵，“是生活本身的升华，而不是生活外饰的升级”（*Sesame*: 55）。但在他看来，世人都受了死亡天使的蛊惑，拿生命去换荣华富贵，“渴望在生活中出人头地，却不知道什么是生活；渴望更多的马匹、男仆、财富和荣誉，却不要灵魂。而真正让人出人头地的，是心肠不断变软，血液不断变热，大脑不断变快，精神进入充满生机的平和”（*Sesame*: 56）。这种平和就是他所说的“野橄榄花冠”，不是珠光宝气的虚荣，而是真正的幸福。^① 这种幸福也正是财富的古义（weal/ wel/ well）。

三、“财富”的新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唯有生命才是财富”（There is no Wealth but Life）。罗斯金的这个新定义早已脍炙人口。不过，这里的“生命”不只是活着，而是活出一种完美的状态，带有明显的伦理意味：“生命，包括了它全部爱、愉悦和倾慕的力量。能培养出最大数量高尚且幸福的国民，就是最富有的国家；而最富有的人，就是能将自己的生命发挥到极致，并通过其本人及其财产对他人的生命产生最为广泛的影响。”（*This*: 222）这便类似于伦理学家查尔斯·L. 斯蒂文森所说的“劝导性定义”^②，重新定义人们熟知的术语，改变其描述意义，并使之具有褒扬性的情感意义。劝导正是罗斯金原富的目的，他道德重构的核心便是“人”，是要恢复业已被现代学者埋葬了的“人的经济学”（Human Economy）（see *Works*: 27: 14）。他在《给那后来的》中语带双关地指出，“财富的脉络”（The Veins of Wealth）是紫红色的，不是金矿

① John Ruskin, *Time and Tide and The Crown of Wild Olive*, London: George Allen, Ruskin House, 1907, p. 230.

② See Charles L. Stevenson, *Ethics and Langu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5, p. 210, p. 214.

石的纹理，而是人的血脉；制造财富，最终也就是制造“身体健康、目光敏锐、心情愉悦的人”，而“我们现代财富”却与此背道而驰，政治经济学家们并不把人看做于财富有益（*This*: 189）。罗斯金指出，对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情感和精神。人不是机器，人有灵魂，其燃料就是情感，而“政治经济学是史上最为奇怪、最不可信的谬论，它居然认为人的社会行为不受社会情感左右”（*This*: 170, 167）。

罗斯金将他的新定义放在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中提出，不仅要揭示这门显学对“财富”的界定误导了世人，还想使它分担道德教化的责任。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绪论中提出：“可将财富定义为一切具有交换价值的有用或合意的物品；换言之，所谓财富就是一切有用的或合意的物品，只要刨除那些不付出劳动或做出牺牲便可随意得到的物品”；“所谓富有，就是拥有大量有用的物品”。^① 罗斯金重点修正了“有用”（*useful*）一词，强调了“有用”的两个必要条件。一是物品要有内在有用性，也即固有价值（*intrinsic value*）；二是物品要在适合的人也即勇者手中，才能有实际价值（*effectual value*）。（*see Works*: 17: 153–154）两者缺一不可，也即说，财富是“勇者拥有有价值的东西”（*This*: 211）。而且，“勇者”和“有价值”原本就是同源的，都与“生命”息息相关。《给那后来的》第四篇题为《论价值》（“*Ad Valorem*”），该文根据“*valorem*”一词的拉丁语词源给其一个“真正的定义”：“*valorem*”的主格是“*valor*”（勇武），而“*valor*”来自“*valere*”，意为“强健”。指人，便是生命强健，或曰英勇（*valiant*）；指物，则应促进生命，或曰有价值（*valuable*）。因此，有价值也就是“能够全力促进生命”，这才是财富的真正内涵（*see This*: 208–209）。

罗斯金的上述两点修正，第一个方面是批驳政治经济学对交换价值的强调，将价值从交换价值中解脱出来。斯密在《国富论》中已经指出：“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含义，有时指某一物品的有用性，有时指因拥有该物品而具有的购买其他商品的能力。前者可称‘使用价值’，后者则称‘交换价值’。”^② 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并非不知道“价值”可以指“有用性”，只是认为从学科的角度来说研究的重点应该是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③ 如穆勒所言，在政治经济学术

①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第21、18页。

②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win Cannan, ed.,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94, p. 31.

③ See John Tyree Fain, “*Ruskin and the Orthodox Political Economists*”, in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10.1 (1943), pp. 5–6.

语中,“价值”如果不加修饰语或限定词,通常就是指交换价值。^①随着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传播,日常话语也渐受影响,交换价值乃至其货币表现形式(价格)更多地被用作衡量标准,因此也就不乏王尔德讽刺的那种人——“知道一切物品的价格,却不知任何物品的价值”^②。罗斯金的忧虑正在于此。他认为,有些物品对人有害,但仍可买卖,因而有交换价值,在经济学上是“有用的”;但真正有用的物品应促进人的生命,而且这种有用性是物品固有的,不因供需或交换价值而变。

第二个方面强调物品要在合适的人也即勇者手中。罗斯金认为,不能只是拥有(have),还得能用(can),而且不能滥用(from-use/ab-use)。例如,人皆有躯体,滥用则无法报效国家,只能苟延残喘,如同行尸走肉,也即希腊人所说的“idiotic”(个人或私人的),在英语中便成了“idiot”(白痴),用来指那些只顾个人利益的人(see *This*: 210-211)。用得合理还不够,还得用得合度,“一个人不能同时住在两栋房子里”。过度则是“Illth”(罗斯金新造的与Wealth相反的词),会带来各种破坏和灾难。罗斯金希望时人能克制利欲,将精力用在更有价值的地方。他认为,关于财富的通俗观念混淆了财富的“保管”和“拥有”之间的区别。真正富有的人,并不是财产的拥有者,而是财产的保管者(see *Works*: 17: 168)。这种境界便是罗斯金所说的“勇”(valiant),也即“高尚”或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男子气概”,它可以使人的灵魂摆脱世俗财富的奴役。

罗斯金修订的这两个方面——固有价值和实际价值,既涉及物品及其拥有者,又分别对应着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他认为这两个环节均与道德有关,如他在《报以灰尘》中所说,从一国之民所产之物,可见其既往品性;从其消费方式,可见其未来品性(see *Works*: 17: 178)。罗斯金不断强调生产环节的道德因素,也是对维多利亚时代商品生产过程中弄虚作假、破坏环境的种种恶习的直接回应。如他所说,生产要保证质量,让民众“花了钱,买到的面包就是面包,啤酒就是啤酒,服务就是服务”(see *This*: 164)。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剥削性和消费趋向的误区。他在《野橄榄花冠》序言中说:

当今时代,资本的大部分获利性投资都是这样,即大众被诱劝去买无用之物,资本家则从这些物品的生产和销售中提成获利(percentage);与此同时,大众却被蒙蔽,被诱导着认为资本家的这种提成收益乃是真正的国

① 详见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第498页。

② Oscar Wilde, *Plays, Prose Writings and Poems*, p. 465.

民收入，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从穷人钱包里偷钱，让富人的钱包鼓起来而已。^①

理想的状况应该是厂主和商人真正起到引导良性消费的作用，帮助社会“生产”高素质买家（see *This*: 164, 207）。同时，消费者也应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或罗斯金所强调的“品味”：“经济学家至今尚未认识到，人的购物倾向完全属于道德范畴。也即说，你给一个人半克朗，他能变富还是变穷，取决于他的性情——看他是用这些钱来买疾病、堕落和憎恨，还是买健康、上进和亲情。”（*This*: 207）正是考虑到了经济领域的诸多道德因素，罗斯金才对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伦理要求：“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教导国民去渴求并生产那些能够促进生命的东西，教他们鄙视并摧毁那些引向毁灭的东西。这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不要把它和号称政治经济学的伪科学（bastard science）混为一谈，正如不要把医学和巫术看成是一样的，也不要把天文学与占星术当成一回事。”（*This*: 209）

四、政治经济学的伦理维度

关于罗斯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学界历来存有争议。反对者从经济学角度揭示罗斯金经济思想的肤浅，如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就认为，罗斯金所抨击的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学的“通俗版本”（vulgar versions），穆勒等经济学家虽然也会像罗斯金一样对社会不公感到痛心疾首，但不会认同罗斯金的观点。^② 这种评论没有切中要害，因为罗斯金批判的核心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而是它对当时的知识话语和思想体系的影响以及它所忽略的更为急迫的社会问题，如他所说：“我并不是说它的理论没道理，只是认为它用在现阶段的社会不太妥当。”（*This*: 168）支持罗斯金的学者，如 F. R. 利维斯，则认为他“对正统政治经济学的毁灭性批判是一项伟大而又高尚的成就”^③。这显然是过奖了，罗斯金并没有想对政治经济学原理做“毁灭性批判”，反倒是想做建设性批判，试图恢复或增加这门学问的伦理维度，用“常识偏见”来改变当时对“财富”等关键词语的“学术偏见”，

① John Ruskin, *Time and Tide and The Crown of Wild Olive*, p. 219.

② See J. L. Bradley, ed., *Ruskin: The Critical Heritage*, pp. 419–420.

③ F. R. Leavis, “Introduction”, in F. R. Leavis, ed., *Mill on Bentham and Coleridge*,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0, p. 36.

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种有助道德重建的力量,如他所言:“家庭经济学调整一家之行为习惯,政治经济学则调整一国或一社会之行为习惯,关乎其维继方式。政治经济学既非艺术,也非科学,而是建立在诸科学的基础之上、指导人文学科的一套行为和立法体系。而且,只有在特定的道德文化条件下才有可能。”(Works: 17: 147)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是伦理的而非商业的。他在《给那后来的》中提到,该书一是为了给财富下一个准确且固定不变的定义,二是为了说明财富的获取离不开一定的道德条件(see This: 162)。

罗斯金的这番努力恰恰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形成了一种反动,如托马斯·卡莱尔所说,就像一场霍乱横扫了这门“沉闷的科学”(Dismal-Science)^①。政治经济学在18世纪后期逐渐成为一个明确的研究领域,19世纪初正力图成为一种“科学”或专门学科,因而有去伦理化的意图,要剔除宗教和道德因素的掣肘。穆勒说政治经济学无关道德,^②就是要把它当做一门独立学科,专门探究经济领域的“自然”规律。经济学也日趋注重微观层面,到19世纪末,“政治经济学”这个称谓变成“经济学”,抹去了“政治”所含的社会、国家之意。^③但实际上,经济学很难完全摆脱伦理而做到“客观中立”。^④在道德话语已成为呼吸空气的英国,也很难真正去道德化。况且,当时的学术分工尚未深化,学科壁垒也不够森严,斯密、穆勒、罗斯金等人都是跨学科的通才,他们的经济学论述中都不乏道德思考的印记。经济学家熊彼得就认为斯密受道德哲学影响太深,未能实现将伦理学排除在经济学之外的目标。^⑤但实际上,斯密一直没有中断其伦理研究,在写《国富论》的同时也在修订《道德情操论》,晚年更是在《道德情操论》第六版中专门增加了一章(即第一卷第三篇第三章),强调对财富和权势的崇拜会败坏道德情操,不如崇拜智慧与美德。^⑥这也是他在《国富论》“去道德化”之后的一种“再道德化”,可以说,这位“政治经济学家”始终是一位“道德哲学家”。后来的穆勒也没能完全抛开伦理维度,直到19世纪末,剑桥著名经济学教授马歇

① George Allan Tate,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omas Carlyle and John Ruski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89.

② 参见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第497页。

③ See Robert L. Heilbroner, *The Worldly Philosophers: The Lives, Times, and Ideas of the Great Economic Thinkers*, London: Penguin, 2000, p. 176.

④ 经济学术语常带有情感意义,如斯密和穆勒所说的“非生产性劳动”,实际上就暗示了从事这种劳动的人的无性和寄生性(see Charles L. Stevenson, *Ethics and Language*, pp. 215-216)。

⑤ See Joseph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Taylor and Francis e-Library, 2006, p. 177.

⑥ See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pp. 61-66.

尔还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书名已不同于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开篇强调:“经济学一方面是研究财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属于对人的研究的一部分。”^①或如有评论家所言,罗斯金与穆勒等人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伦理维度,而在于伦理侧重点不同,穆勒等人看重自由,而罗斯金看重的是正义、团结和爱。^②显然,这种差异引起的辩论对经济学的发展大有裨益。如科克拉克(Cockram)所言,罗斯金主要关心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道德关怀的边缘地位”,他对“财富”和“价值”的分析动摇了古典经济学家的自满,迫使其重估经济学作为精密科学(exact science)的地位。^③

尽管如此,罗斯金的经济学思想却一直没能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④,它对英国的社会政策及福利制度的现实影响也没有得到足够的考证^⑤。不过,罗斯金原富的意义并不仅限于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它还反映了当时的文人为消除知识话语领域混乱状态而做的努力。不妨先看两位传记作家对他的评论。弗雷德里克·哈里森认为,罗斯金的经济学评论《报以灰尘》是在“玩弄一个他几乎一无所知的学科”即新兴的社会学^⑥;蒂姆·希尔顿认为,罗斯金用的是伦理和象征语言,与专业经济学家没有共同术语。^⑦两人似乎认为罗斯金是社会学或经济学的“门外汉”,但从当时的文化背景来看,经济学和社会学其实已经像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样,超越了各自的学科范畴,进入了“公共”话语空间,成为当时文人的共享知识,它们的很多专业术语也就自然地在文人笔下流淌(与罗斯金、狄更斯、卡莱尔一道评点政治经济学的“非专业人士”不胜枚举)。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经济学要力争成为一个有自己独立疆域的学科;另一方面,它的话语又渗透进了其他学科和公共领域,最终导致了“众声喧哗”的混乱状态。因此,当时不仅有马修·阿诺德提出的与“文化”相悖的“无政府状态”,

①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Porcupine Press, 1982, p. 1.

② See James Clark Sherburne, *John Ruskin or the Ambiguities of Abundan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120 - 122.

③ Gill G. Cockram, *Ruskin and Social Reform: Ethics and Economics in the Victorian Age*, London: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2007, p. 205.

④ See Willie Henderson, *John Ruskin's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23 - 24; Alan Lee, "Ruskin and Political Economy: Unto This Last", in Robert Hewison, ed., *New Approaches to Ruski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 p. 68.

⑤ See Jose Harris, "Ruskin and Social Reform", in Dinah Birch, ed., *Ruskin and the Dawn of the Moder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9.

⑥ Frederic Harrison, *John Ruskin*, London: Macmillan, 1902, p. 103.

⑦ See Tim Hilton, *John Ruski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96 - 297.

也有穆勒在《时代精神》中所说的“知识无政府状态”(intellectual anarchy)^①。很多文人对此都深有感触并探寻拨乱反正的路径。约翰·亨利·纽曼指责政治经济学在财富问题上实际已经“越界”侵入了伦理领域,应该退回到它自己的学术范畴;^②罗斯金则更为激进,试图借助词语系谱学来追本溯源,刮垢磨光,构建新的权威话语体系,让伦理回归经济学领域。

这番努力之艰辛不难想象,罗斯金甚至一度被视为散播异端邪说的人,^③正如有评论家所指出的,随着“科学的”经济学以重农主义和古典学派的面孔出现,再坚称经济学与伦理关联密切就成了异端。^④罗斯金不仅敢做异端,还拿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权威穆勒开刀,的确需要穆勒在《论自由》里所褒扬的心智方面的“道德勇气”^⑤,也就是严复所译的“刚大勇直之心德”^⑥。严复在罗斯金逝世的次年译出斯密不失文采的《国富论》,取名《原富》,探究富国裕民之道,距今已逾百年。这百余年所见证的,是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为追求“精密科学”地位而日渐采用数学语言(mathematical language)、压缩言词语言(verbal language)的空间的过程,这不仅加深了斯诺(C. P. Snow)所谓的“两种文化”的鸿沟,也加速了人文精神的衰微。^⑦乔治·斯坦纳认为,自17世纪以来,经验和现实领域“逃离言词”的趋势愈演愈烈,词语王国的疆域正在大幅缩减,就连人文学科都未能幸免。当下语言危机的严重程度远甚于罗斯金的时代,守护文字的文人理当多一点焦虑。

[作者简介] 乔修峰,男,197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英语语言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英美室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19世纪英国文学与思想史。近期发表论文有《卡莱尔的“社会理念”》(载《外国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等。

责任编辑:张 锦

① J. S. Mill, *The Spirit of the Age, On Liberty, The Subjection of Woman*, Alan Ryan, ed., New York: Norton, 1997, p. 7, p. 9.

② See John Henry Cardinal Newman, *The Scope and Nature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A. R. Waller, ed., London: Dent, 1903, pp. 78-79.

③ See John D. Rosenberg, *The Darkening Glass: a Portrait of Ruskin's Geniu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3, p. 131.

④ See James Clark Sherburne, *John Ruskin or the Ambiguities of Abundance*, p. 107.

⑤ J. S. Mill, *The Spirit of the Age, On Liberty, The Subjection of Woman*, p. 66.

⑥ 穆勒《群己权界论》,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37页。

⑦ See George Steiner, "The Retreat from the Word", in *Language and Silence: Essays o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the Inhuman*, New York: Atheneum, 1967, pp. 12-35.